

试论清代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影响：以外蒙古地区公文书为例

锡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蒙古文字作为满文的原型，给予满文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在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文的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蒙古地区广泛使用满文，致使蒙文公文书中出现了来自满文的多方面影响。通过对满蒙文两种公文书的比较研究，详细分析蒙文公文书中出现的爵位职官名称、满文书写方式、满文批示等实例，可知清代外蒙古地区蒙文公文书，在一些固定名词的借用、个别书写方式以及签字批示等方面，均受到来自满文公文书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满文；蒙文；公文书；影响

中图分类号马 K24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清朝在其统治下的蒙古地区实施了，所谓“盟旗制度”的这一统治体系。在盟旗制度下，蒙古各级官署，以相互传递大量的公文书来执行政务。清代外蒙古地区的公文书，主要由满文与蒙文两种文字书写（在清末也出现了不少汉文公文书）。翻阅当时的文书档案，我们不难发现满蒙文公文书，在用词与书写等方面有着诸多极其类同之处。

本文主要以蒙古国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朝外蒙古地区地方行政单位的满蒙文公文书为例，通过具体实例探讨两者之间在用词与书写方式等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论述满文公文书对蒙文公文书的影响。其意义在于，通过探讨上述问题，一方面可以看出在清朝这一历史时期，蒙古地区的文书制度与公文书其本身的一些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满蒙这两种语言文字，在用词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与交融。

众所周知，自古至今各级行政机构之间，利用传递公文书，从而相互交流信息，并传达政令。公文书从书写格式、处理程序到传递均有严密的制度，并通过系统化的文书制度往来于各级行政机构之间。为更好地理解本文的关键内容，在此首先概述清朝治下的蒙古地区的相关文书制度。

二、清代外蒙古地区的文书制度

清朝政府将除八旗蒙古以外的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内属蒙古包括察哈尔八旗、呼伦贝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旗。除内属蒙古以外的地区被统称为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又以戈壁沙漠为界，分为内外蒙古，漠南为内蒙古，漠北为外蒙古。

清朝政府在外藩蒙古施行的盟旗制度是一个划分行政区划的统治体系。以旗为基础行政单位，旗上设盟。各盟受理藩院管辖，盟与理藩院之间设有驻防官衙门。^①乾隆 47（1782）

年清政府将外藩蒙古划分为 10 盟 135 旗，内蒙古设 6 盟 49 旗，外蒙古设 4 盟 86 旗。

旗与盟均设有各自的印务处，即为官署。这些官署以书写、传递、批示大量的公文书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清代外蒙古地区的公文书，主要以满文和蒙文公文书为主（清朝末期也出现了一些汉文公文书）。通常，在旗和盟的印务处以书写蒙文公文书为主，盟以上的官署，如驻防官衙门以书写满文公文书为主。当旗和盟收到来自上级衙门的满文公文书时，须将它一一翻译成蒙文。与此相反，旗和盟要向上级衙门发送公文书时，则把蒙文公文书翻译成满文。^[1]

清代满蒙文公文书均须按照一个固定的格式书写。对此日本学者萩原守先生的研究最为详尽，他在《清代蒙古的裁判制度与裁判文书》一书中曾指出，进入清朝，清政府遵照中国内地的汉文公文书的书写规范，制定了满蒙文公文书的格式，早在乾隆初期，就出现了遵循汉文公文书程式的满蒙文公文书。^[2]

在清代外蒙古地区，往来于各级官署间的公文书，均以折式纵长方形为主。折本上下长约 24-25 厘米，左右宽约 10-11 厘米。翻开折本后的左右长度，因粘贴纸张的多少而不等，长者可达数十米。

蒙文公文书的书写规则与满文公文书相同，书写时字移与行移的方向均为“自上而下，自左至右”。蒙文公文书在格式方面，除极少数特殊的公文书外，绝大多数均遵照一个特定的格式书写。由①文件作者；②受文者；③事由；④正文；⑤结束语；⑥后书等六个部分组成。这六个部分缺一不可，并且必须按照上述①-⑥的顺序书写。

“文件作者”与“受文者”均须标出所有的职衔和爵位。文件作者一般以“……un bičig（……的文书）”的形式出现。受文者一般以“……tan-a erg übe（呈……）”，“……tan-a ilegebe（送……）”，“……tan-a tusiyaba（命……）”的形式出现。“……”的部分为受文者，“tan-a（尊称）”之后的动词，表示文书的发送形式。例如，“erg übe”^②用于上行文书，“ilegebe”用于平行文书^③，“tusiyaaba”则用于下行文书。^④

“事由”部分的固定套语以“medeg ülk üučir（为呈……事）”，“yabuylqu ućir（为送……事）”，“tusiyaqu ućir（为命……事）”等形式出现。在大部分蒙文公文书中，“事由”部分并不表示文书的内容提要，而只是叙明文件制作发送的方向。如“medeg ülk üučir”用于上行文书，“yabuylqu ućir”用于平行文书用，下行文书则用“tusiyaqu ućir”。

“事由”之后不改行，直接进入“正文”。正文是一个公文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叙述问题，明确行文目的。叙述完正文后，须以固定的套语来结束正文。这些套语“eg ün-ütula erg übe（为此呈报）”（上行文书），“eg ün-ütula ilegebe（为此送）”（平行文书），“eg ün-ütula tusiyaba（为此命）”（下行文书）的形式出现。这些固定套语也是公文书的“结束语”部分。通常，行文方向决定结束语的选用。如果是向上下级诸衙署一并通告、公布的文书，须把上述结束语的逐类列举出来。结束语之后，间隔数行书写“后书”。后书部分在文书末尾，主要以公文成文时间和印章为主要组成部分。

此外，关于公文书处理程序，官署之间发送的公文书可分为发送用的正本和存档用的副本（又称稿本）两种。书写好的正本在发送前，须把全文抄录在“行文档”^⑤中，再把该公

文书的发送日期、发送目的地、以及内容提要逐一记录于“日志”。⑥收到公文书的官署，首先把该文书的受理日期、发送官署以及内容提要记录于“日志”后，再把该文书的全文抄录到“来文档”⑦中。这些档册以公文书的收发日期为顺序，记录该官署的所有行文和来文。关于这些档册的大小规格，据笔者所见蒙古国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所藏档册，多为边长 28-30 厘米之间的正方形档册。档册的厚度不等，通常 10-40 厘米厚的档册较为普遍。一本档册中抄录的档案数量，有以月为单位的，也有以季度为单位的。这也是造成档册薄厚不等的原因。

三、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影响

如上所述，旗与盟的印务处以书写、传递、批示大量的公文书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盟印务处作为中间行政机构，承担满蒙文公文书的互译。在这两种语言文字的互译过程中，出现了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与交融的现象。以下，就清代外蒙古地区蒙古文公文书中的满语借词、满文式书写方式、满文批示等三方面，探讨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影响。

（一）爵位称号的借用方式

在清朝统治下的蒙古地区，随着盟旗制度的建立，在各盟旗的行政单位均配属了行政官僚。各盟设有盟长、副盟长、副将军（只限于外蒙古地区）、帮办盟务（只限内蒙古地区）、参赞（只限外蒙古地区），旗内设有旗长、协理台吉、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领催等职衔。旗最高行政长官为旗长（又称扎萨克），各旗旗长主要由被清政府授予爵位的蒙古贵族以世袭的形式担任。盟最高行政长官为盟长，主要从旗长或闲散王公（非扎萨克的贵族）中选出。清政府授予蒙古贵族的爵位称号与满人贵族的爵位称号大体一致。当时蒙古地区所使用的爵位称号以及职衔名称，基本借自满人八旗制的爵位称号和职衔名称。这些满语的爵位名称以及官衔名称，被音译或意译到蒙语中时，出现了一些独特的形式。据笔者观察，满语爵位名称以及职衔名称被借入到蒙语中时，基本以音译、意译、音译意译混合等三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蒙文公文书中。“音译”是，将满语的语音成分基本都音译到蒙古语的形式；“意译”是，把满语词意译为蒙古语的形式；“音译意译混合”是，在一个名词里，既有从满语音译部分，也有意译部分的形式。以下列举清政府授予蒙古贵族的部分爵位称号，来分析上述三种不同形式的相关特点。

① 和硕亲王

满：ᠬᠣᠰᠣᠢ ᠴᠢᠨ ᠤᠯᠤᠰ hošoi cin wang

蒙：ᠬᠣᠰᠤᠢ ᠴᠢᠨ ᠤᠯᠤᠰ qošui čin wang

“和硕”一词的满文写法（ᠬᠣᠰᠣᠢ）和蒙文写法（ᠬᠣᠰᠤᠢ），虽然在符号形式方面有所不同，但不难发现在满语和蒙语的读音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和硕亲王”这一满语名称的语音成分，基本上都被音译到蒙语中。因此，两者间的读音以及拼写方式呈现出了极其类同的特征。我们称这类词语为音译名词。

② 额駙

满：ᠡᠬᠡᠭᠡᠳᠡ efu

蒙：ᠡᠭᠡᠳᠡ efu

“额駙”一词的情况与上述“和硕亲王”的情况基本相同。除了音节“fu”的部分中，满

文和蒙文“”与“”的表记符号有所不同之外，两者间的读音基本相同。因此，“额驸”一词也属于音译名词范畴。

③ 镇国公

满： *gurun be dalire gung*

蒙： *ulus-un tüsiy-e güng*

满语和蒙古语的“镇国公”一词，在拼写方式和读音方面，均有一定程度上的区别。它的区别并非只是拼写符号方面的不同，其读音也完全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蒙古语意译了满语的“镇国公”一词所致。如，将满语的“”译为蒙古语“”、满语的“”译为蒙古语“”。可以说，蒙古语的“镇国公”一词，属于意译名词范畴。

④ 辅国公

满： *gurun de aisilara gung*

蒙： *ulus tur tusalaychi güng*

“辅国公”一词的与上述“镇国公”一词基本相同。该词的满语和蒙语的拼写方式和读音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来自蒙语意译了满语的“辅国公”一词的结果，所以，“辅国公”一词也属于意译名词范畴。

⑤ 多罗郡王

满： *doroi giyün wang*

蒙： *törü-yün giyün wang*

“多罗郡王”一词，需分为“多罗”和“郡王”两个部分来探讨。“多罗”部分，在满语和蒙古语中的拼写方式和读音方面都有较大的区别，而在词意方面则是相同的。因此，“多罗”部分属于意译名词范畴。然而，“郡王”部分，除“g”的表记符号有所不同之外，其读音基本相同，属于音译满语名称范畴。也就是说，在“多罗郡王”这个名词当中，既有意译部分，也有音译部分，两种不同的形式同时存在于一词之中。笔者将这类词语称为音译意译混合式名词。

⑥ 多罗贝勒

满： *doroi beile*

蒙： *törü-yün beyile*

“多罗贝勒”一词与上述“多罗郡王”一词相同。“多罗”部分是译意名词，而“贝勒”部分则是音译名词。因此，“多罗贝勒”一词也属于音译意译混合式名词范畴。

⑦ 固山贝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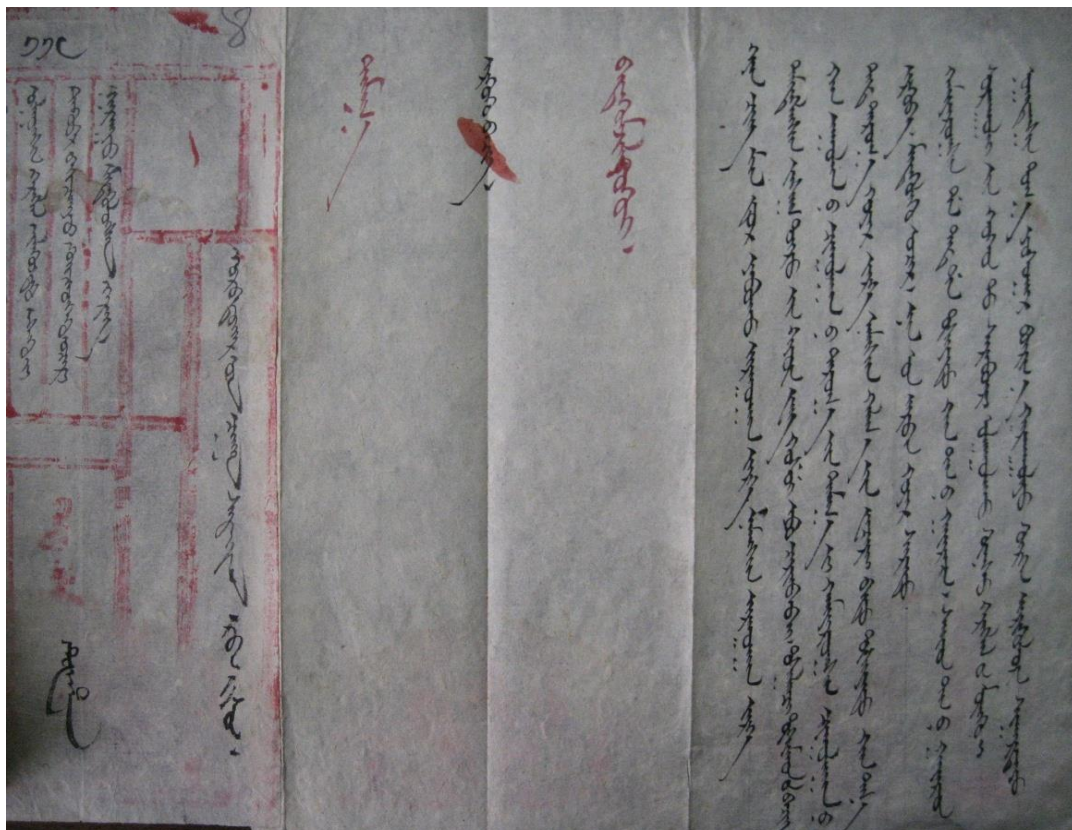
满： *gūsai beise*

蒙： *qosiyun-u beyise*

该词与上述“多罗郡王”和“多罗贝勒”二词大致相似。满语的“”被意译为蒙语的“”，满语的“”被音译为“”。因此，“固山贝子”一词属于音译意译混合式名词范畴。

通过对上述满语和蒙语爵位名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满语爵位名称大致以（1）

音译；（2）意译；（3）音译意译混合等三种不同形式出现在蒙文公文书中。这类不同方式的满语借词，不仅在蒙文公文书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期，这些借词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蒙语中满语借词的存在，说明了满语和蒙古语在不同层面、不同范围、不同角度，有着密切接触。特别是，音译意译混合式的出现，更加体现了满语和蒙古语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深层次的接触与融合。



图片 1 写有爵位称号的蒙文公文书。档案卷宗号：Φ.Ho.M-9 T.Ho.4 X.H.Ho.2156

（二）书写方式的影响

在清代蒙文公文书中，除了有一些直接受满文影响的借词外，还有一些来自满文书写方式的影响。众所周知，满文是借用蒙文字母体系，为记录满语语音而创制的文字符号系统。最初的满文是由巴克什额尔德尼奉努尔哈赤之命，于明万历 27（1599）年创制。额尔德尼所创制的满文，被称为“无圈点满文”。之后，达海奉皇太极之命，于天聪 6（1632）年，在额尔德尼初创的满文基础上进行了改良，随之诞生了“有圈点满文”。

“有圈点满文”的最大特点就是解决了“一字多读”（个别音节字母有两种不同读音）的问题。对于母语为非蒙语的人来说，识别“一字多读”的字母读音，并非易事。通过对字母附加圈和点的方式，区别一个字母的不同读音，从而，为满文阅读者，能够准确地判断读音和词义，提供了捷径。除此之外，“有圈点满文”还加创了一些专门拼写外来词汇的特定字母符号。

“有圈点满文”由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对当时的蒙文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清代蒙文公文书中看到，一些“有圈点满文”式的书写规则和原本蒙文字母中不存在的字母符号。笔者通过对蒙古国国立中央档案馆所藏的相关蒙古文公文书的分析，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① 在“ da”字母后面加“点”的书写方法

例如，“da（首领，长官）”、“daruy-a（长官）”、“dangsa（档册）”、“dayaju（跟随）”、“darui（即）”、“dangci（太）”等词语的“da”音节的后面均加了“点”。书写成为“ ”、“ ”、“ ”、“ ”、“ ”、“ ”等。

② “p”和“k”字母的满文拼写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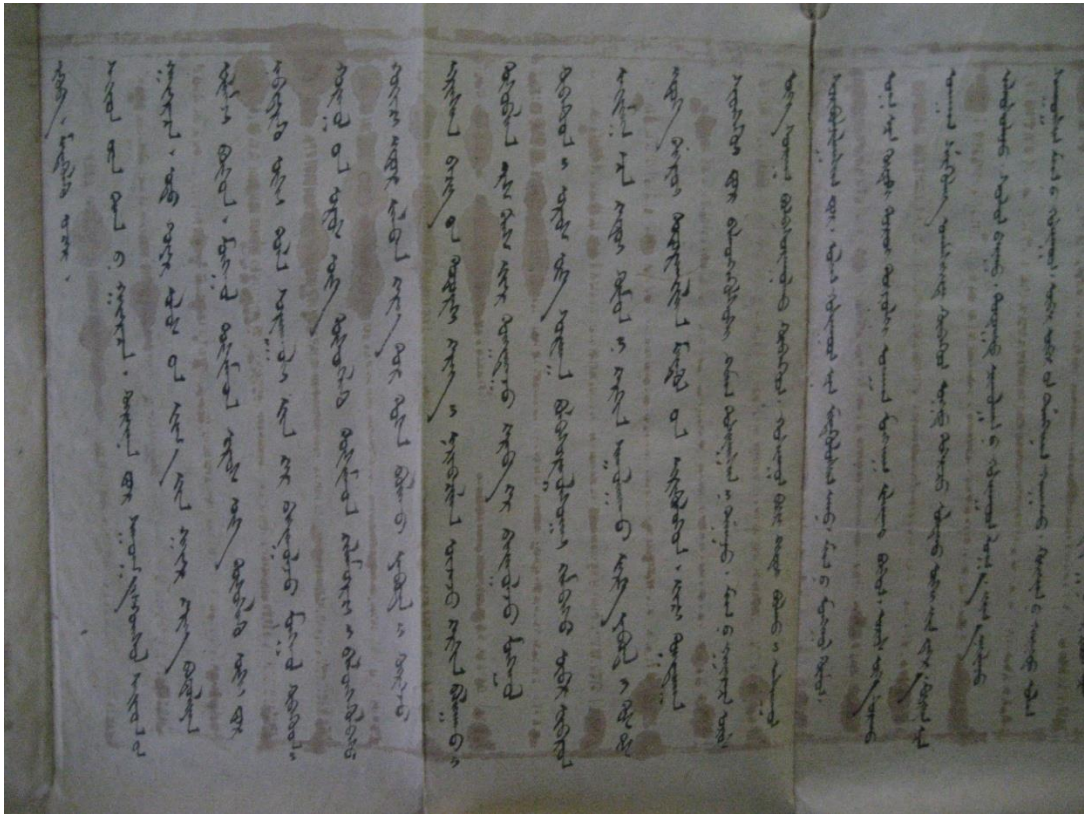
对于一些外来词汇的拼写，蒙古文借用了“有圈点满文”的拼写方式。例如，外来词语中含有“p”和“k”字母的词语，就有用满文的“ ”和“ ”来拼写的实例。“p”字母在当时的蒙文中大多用于人名，如“ sonumpil”、“ dorjipalamu”等。再如，满文“k”字母的拼写方式，多见于“kongsul（公使、领事）”一词的拼写中，“kongsul”写成“ ”。

③ 汉语借词的表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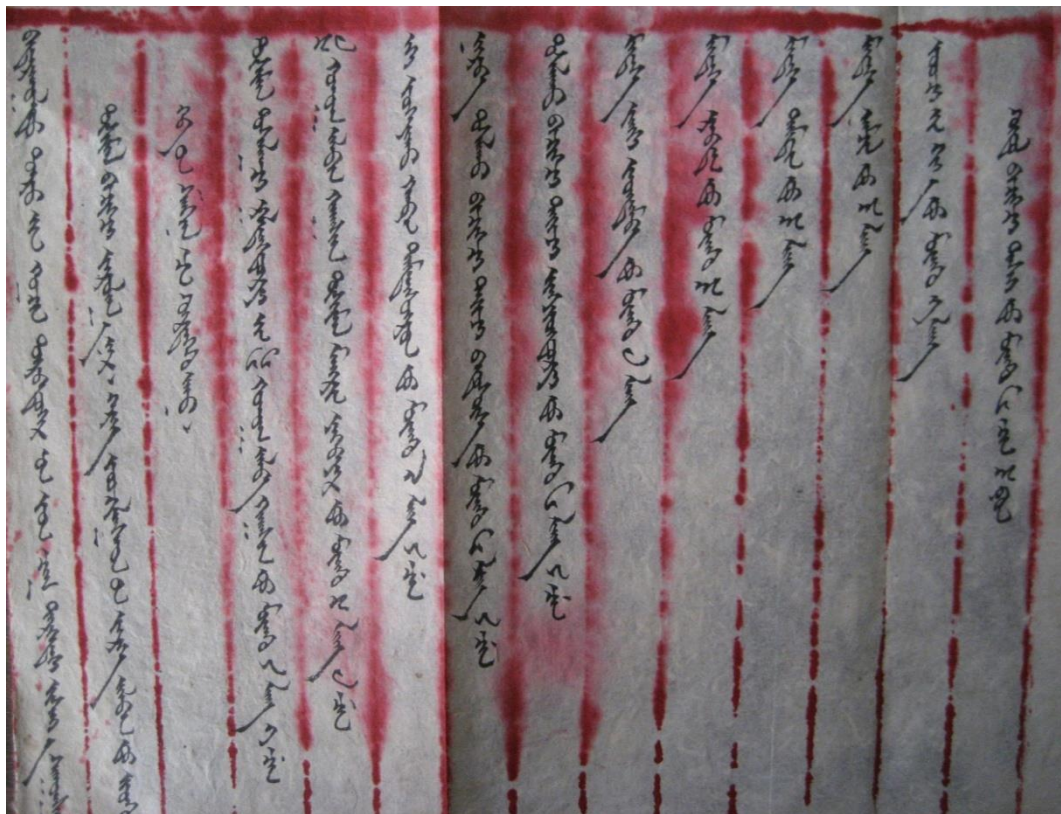
在清代蒙文公文书中，较为多见的汉语借词有“čen（钱）”、“ho（毫）”、“pun（分）”、“sy（丝）”等重量词。这些词语的蒙文拼写法中就有直接借用满文拼写法的实例。例如，将“čen（钱）”拼写为“ ”，“ho（毫）”拼写为“ ”，“sy（丝）”拼写为“ ”等等。

当然，上述实例并不是清代蒙古文公文书中的普遍现象，而是个别事例。这种个别现象，在蒙古文公文书中，并没有被视为错误或不妥。其原因在于，这种满文式的书写方式，已经渗入到蒙文公文书的书写体系中，已被相关官僚和书吏认可。在清代蒙古地区各地方行政组织，有着极为严格的书吏培养制度和体系。在这个制度中，有对书写错误的书吏进行严惩以及对书写规范的书吏给予赏赐的规定。这种赏罚分明的书吏培养制度，不仅培养了优秀的书吏，而且也确保了公文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⑧换句话说，通常公文书中，不易发生书写错误。在当时，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式书写方式，并不是书写错误，而是被认可的一种书写方式。

由此可见满文的书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蒙文公文书的书写体系中，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蒙古文的书写方式。这种影响，不仅丰富了蒙文公文书中的内涵，也为蒙文外来词的拼写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图片 2 受满文书写法影响的蒙文公文书。档案卷宗号：Φ.Ho.M-9 T.Ho.3 X.H.Ho.8043



图片 3 受满文书写法影响的蒙文公文书。档案卷宗号：Φ.Ho.M-9 T.Ho.3 X.H.Ho.8478

(三) 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批示

在清代蒙古地区，公文书的处理流程，主要有签收、抄录、传阅、归档等环节。当一个印务处收到另一个印务处发送过来的文书后，要进行处理。所谓的处理，就是把该文书的相关内容收录于“日志”，并将全文抄录到“来文档”之后，由该印务处的负责人进行批阅。该文件经传达及传阅后，无须再利用时，就会被贴好封面存档。

通常，封面的左上端写有该文书的题目（即概括内容的提要），右下方附有受理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封面的左下方，以不同的字迹，并以一字一行的形式写有满文文字和一些用满文书写的数字。这就是蒙文公文书中的满文批示部分。满文批示部分中常见的有“/ (tuwaha)”、“/ (afabu)”、“/ (boola)”等词语。

① “/ (tuwaha)”

“/ (tuwaha)”为“/ (tuwambi)，看、阅”的过去式，意为“已阅”；

② “/ (afab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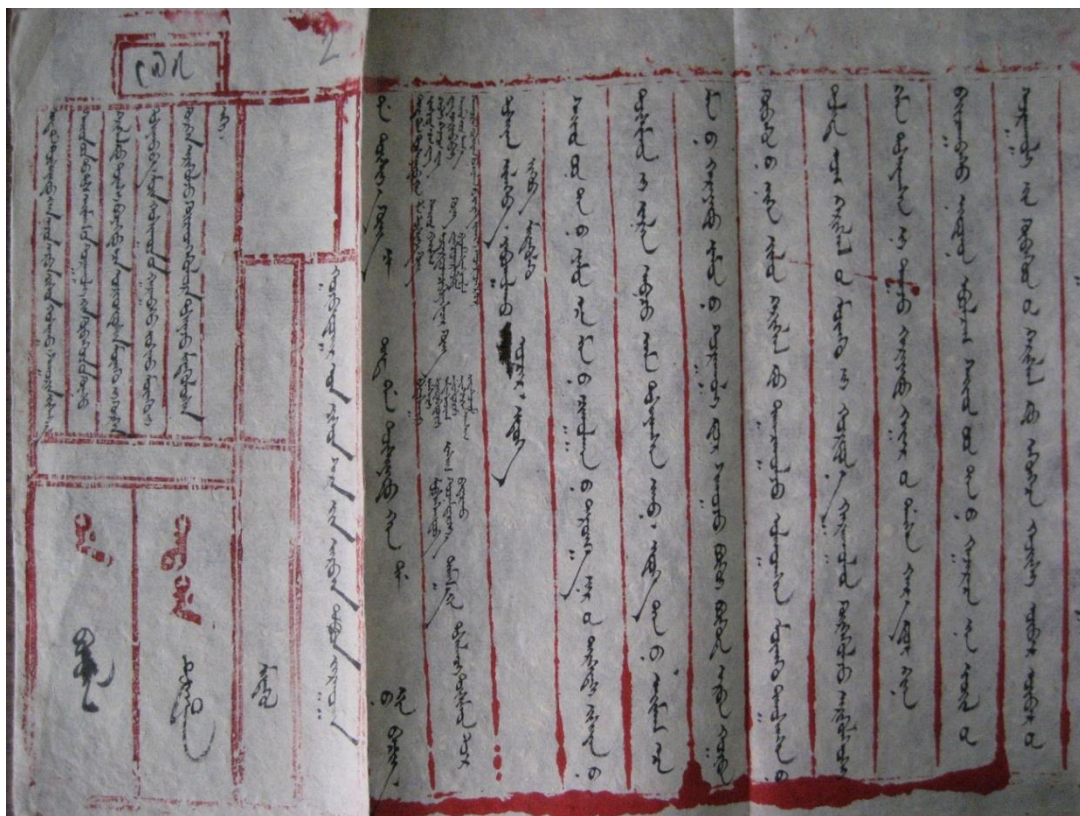
“/ (afabu)”为“/ (afabumbi)，交付、移交”的命令式，意为“交付、移交”；

③ “/ (boola)”

“/ (boola)”即为“/ (boolambi)，禀报、呈报”的命令式，意为禀报或呈报。

从上述词意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满文文字是该公文书批阅者的签字。当时的公文书批阅者，在已受理的文书封面上，以签写这些满文文字方式，来表示已阅读过该文件，并且提出了对该文件的处理意见。除了上述满语词语批示以外，还有以“/ / (juwan duin)，十四”、“/ / (ice sunja) 初五”等的文件批阅日期，作为批示签字的例子也不少。

就笔者眼界所及，通常在一份文件上有一至四个签字，签字者大多为该印务处的最高行政长官。如，在盟印务处，就要由盟长、副盟长、将军、参赞等人签字。另据笔者调查，在清代外蒙古地区，写有满文批示的文书，在盟或盟以上的官署最为多见，而少见於盟以下的旗印务处。在当时的盟官署，用满文批示文书这一现象从满文公文书开始，逐渐影响了蒙文公文书，并且成为一种文书批示习惯及定规。直到清朝末期的宣统3年（1911年），在外蒙古地区仍保留着这种公文书批示习惯。这一现象不仅充分体现了满文公文书对蒙文公文书的影响之深，同时也说明了蒙文公文书中的满语和满文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图片 4 有满文批示的蒙文公文书。档案卷宗号：Φ.Ho.M-9 T.Ho.5 X.H.Ho.2140

四、结语

清代满蒙文公文书档案是了解当时蒙古社会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研究清代蒙古地区历史和社会的重要史料依据。然而，由于研究视角与目的的不同，多数研究成果以解析满蒙文文书档案中所记载的具体内容为主。与此相比，着重研究公文书形式的成果，却占少数。毋庸置疑，历史公文书形式的研究，在史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研究焦点置于公文书形式，通过对满蒙文两种公文书的比较研究，详细分析了蒙文公文书中出现的爵位职官名称、满文书写方式、满文批示等实例。从而，得出清代外蒙古地区蒙文公文书，在一些固定名词的借用、个别书写方式以及签字批示等方面，均受到来自满文公文书影响的结论。同时也归纳总结了固定词语的借入方式、特定词语的拼写方式以及公文书具体批示方法。

蒙文作为满文的原型，给予满文的影响随处可见。但在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文的这一时代背景下，由于蒙古地区广泛使用满文，致使蒙文公文书中出现了来自满文的多方面的影响。解析这些满文影响的特征，无疑是正确解读蒙文公文书的基础之一，也是了解蒙语和满语，两种不同语言接触现象的重要依据。

注释

①例如在外蒙古地区设有乌里雅苏台定边佐副将军处、科布多参赞大臣处、库伦办事大臣处等。在内蒙古地区设有绥远城将军处、察哈尔都统衙门等。被委任的大部分驻防官都是八旗出身的满族或蒙古族旗人官僚。

他们均有任期，在任期中担任联系当地盟长、旗长以及理藩院的各项工作。

② 指下级官署向上级官署发送的公文书。

③ 指同级官署间往来的公文书。

④ 指上级官署向下级官署发送的公文书。

⑤抄录所有发送文书的档册

⑥公文书记簿。主要以时间顺序记录该印务处的所有来文，行文。来文登记受理日期，发送文件过来的官署名以及文件的内容提要。行文登记发送文件日期，发送至官署名和内容提要。登记在“日志”的文书不区别来文或行文。按收发顺序一并记录。

⑦抄录所有来文的档册。

⑧关于清代蒙古书吏的赏罚制度，笔者已在博士论文《清代外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書記および書記養成に関する研究》（汉译：《关于清代外蒙古书吏与书吏培养制度的研究》）中作了详细探讨，在此不再加以赘言。

参考文献

- [1]萩原守. 清代モンゴルの裁判と裁判文書[M]. 創文社, 2006. 151-152.
- [2]萩原守. 清代モンゴルの裁判と裁判文書[M]. 創文社, 2006. 178.
- [3] 宝玉柱. 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及语言教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 [4]Čebel, Ya. Mongγul alban bič ig-ün ulamj ilal [M]. Studia Mongolica, Tomus 1, Fasciculus 22,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59.
- [5] 雷荣广, 姚荣野. 清代文書綱要[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0.
- [6] Li bao wen. arban doluduγar j aγun-u emün-e qaγas-tu qolbuγdaqu mongγul üsüg bič ig debter [M]. Öbür mongγul-un baγač ud keüked-ün keblel-ün qoriy-a. 1997.
- [7] 劉文傑. 歷史文書用語辭典[M]. 明・清・民国部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8] 中村篤志. <モンゴル国立歴史中央文書館所蔵の財産関係文書 - 清代ハルハ・トシェート=ハン部左翼後旗の文書について -> [J]. 歴史, 2002, (98): 123-142.
- [9] Namsarai. Qing ulus-un üy-e-yin Mongγul qosiγuč iγulγan [M]. Öbür mongγul-un baγač ud keüked-ün keblel-ün qoriy-a. 1984.
- [10] Норовсамбуу, Г. Монголын архив-албан хэрэг, түүний бичгийн хэв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75.
- [11] 岡洋樹. 清代モンゴル盟旗制度の研究[M]. 東方書店, 2007.
- [12] Rinčin, B. Mongγul bič ig-ün kelen-i j üi [M]. Öbür mongγul-un arad-un keblel-ün qoriy-a. 1992.
- [13] Shili, D. Manj u-yin noyarqal-un üy-e-yin mongγul qosiγun-u tamaγ-a-yin γaǰ ar-un alban bič ig-ün qaγulγ-a dangsa-yin tuqai tobči ügülek ü ni [J]. Dumdadu ulus-un mongγul sudulul, 2008, (6,): 82-83.
- [14] シーリン. 清代外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書記および書記養成に関する研究[M]. 博士論文, 2012.

- [15] Shili, D. Čing ulus-un üy-e-yin mongγul alban bič ig-ün doturaki manju bič ig-ün γar-un üsüg-ün tuqai tobč i ögölekü ni” *Mongγul kele bič ig*. (预定刊载 2013 年 2 月号)
- [15] 佟永功.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
- [16] 張我德. 楊若荷. 裴燕生. 《清代文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s of Manchu Language on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s of Qing Dynasty

Xil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As for being the antetype of the Manchu characters, the Mongolian characters gave a strong influence on Manchu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dominance of the Qing, Manchu language w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Mongolian region has influenced the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s in various aspects. Via comparing Manchu and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s, especially analyzing the rank of nobility, official position, the Manchu words and official comments in Manchu language appeared in the Mongolian documents, we can come to a conclusion that Khalka Mongolian area in Qing Dynasty, the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 has borrowed some terms from Manchu, and specific style of writing and the forms of signatures were also influenced by Manchu official document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Manchurian; Mongolian; Official Documents; Influences

收稿日期: 2014-06-11;

作者简介: 锡莉 (197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